

○ 亚热带瞭望
中国地域文化论



陈侃言 吕嘉健
曾 强 周兆晴

广州出版社

序

我们生活的城市正好压在北回归线上，在中国西部与东部结合的两省边界。这样，我们看到的某些文化现象，或许比在别处会看得清晰一些，这就是终于写下这本《中国地域文化论》的主要原故。

地域文化乃至中国南北文化差异的存在，现在“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可是，我们看到始终有些人极力否认中国文化的这种差异性，将其嘲弄为“地方情结”。他们有一种透过所有表面事实去把握本质的眼光，使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统统都视而不见。遗憾的是，这几年南方的经济北伐确确实实不是一种纯经济现象。不去研究一下南方文化，了解南方发生了什么事情，视听闭塞的结果不过是阻止了自己心智发展的道路。

当今文化革新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市场经济与现代资讯社会的形成，导致了文化的产业化、平面化、多元化。通俗文化在精英们视野之外如野草般生长起来。一夜之间，精英文化的导控作用被破坏了。文学艺术必须和人民在一起，不要忘记读者是上帝。其实，古典文学中的一些经典之作，如《诗经》、宋词和明清长篇小说，

原本就是通俗文化的产物。一些先生振振有词地指责通俗文化的废品率极高，然而他们不太情愿看到的事实是，精英文化创作的废品率也同样极高。厚此薄彼只能解释为个人偏好。

人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看自己喜欢看到的东西，这是难免的，也是要有所警戒的。这些年我们已犯过一些厚此薄彼的失误，也作过努力逐步修正。总之，重要的是学会了尊重事实，这是相互沟通的基础。

但愿各位开卷有益。

本书的出版承蒙如下单位和企业给予热情的支持：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梧州支行

梧州市对外贸易总公司

梧州市侨柏工贸总公司

梧州市康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梧州市高望农牧发展公司

谨此表示衷心的谢忱和敬意。

作 者

1994年7月26日

目 录

序 (1)

地域文化备忘录

论南方意识	周兆晴(1)
体认、内化、天人合一	吕嘉健(24)
近水则灵	吕嘉健 曾 强 周兆晴(41)
论南北文化以及珠江文化	吕嘉健(55)
再论地理学文学	吕嘉健(68)
南方文化与南方文学的素质	吕嘉健(82)
论新时期地域文学	吕嘉健(101)
论岭南文体	吕嘉健(122)
岭南文派如何化俗为雅	吕嘉健(140)
文学的商品性	
与作家的社会分工	曾 强 周兆晴(158)
南方市民意识与文学的世俗化追求	曾 强(168)
商品化、都市化、南方文学的崛起	曾 强(177)
从粤剧的发展看珠江文化的若干特征 ..	曾 强(187)
语言的彷徨	曾 强(197)

“粤语热”透视	吕嘉健(207)
彷徨的主体一无所有	吕嘉健(221)
亚热带的缪斯	曾 强(229)
广西文学的“山珍”与“海味”	陈侃言(239)

通俗文化透视

大都市文化建设：一种新的选择	周兆晴(247)
推动“广货”流行的新产业机制	周兆晴(251)
传播珠江文化的岭南广告业	曾 强(259)
岭南文化革新的景观	曾 强(271)
蜕变：通俗文学的生机	曾 强(283)
大众媒介中的文学	曾 强(289)
市场与流通：一个躁动的文化意识	曾 强(301)
通俗与流行：审美观念的嬗变	曾 强(313)
歌坛“岭南风”	曾 强(322)
“新古典主义”的启示	吕嘉健(336)

文坛掠影

论艺术的雅化	吕嘉健(349)
--------	----------

千载共婵娟	吕嘉健(365)
南方散文诗群的风格与发展	曾 强(370)
对八桂文化的艺术思考	曾 强(391)
览史遣笔述岭南	曾 强(400)
理想人格与特区精神的体现	曾 强(404)
市民生态的“浮世绘”	陈侃言(409)
那段历史真正的“插图”	陈侃言(418)
散文诗这朵花	陈侃言(423)
世界为她准备了海洋	陈侃言(428)
人话、鬼话、神话和诗	陈侃言(434)
一片诗心赋真情	陈侃言(440)
同诗一个鼻孔出出气	陈侃言(444)
唐代文苑宫怨诗	陈侃言(449)
深入无浅语	陈侃言(454)
真诚与诗	陈侃言(459)
向元曲借鉴	陈侃言(462)
探索与追求	陈侃言(465)
谈黎耘的诗	陈侃言(469)

论南方意识

周兆晴

影响20世纪中国作家对文化主题进行思考的历史事件要追溯至16世纪。当西方人开始到中国通商、传教，甚至军事入侵，古老恐龙般身躯庞大、举止笨拙的中国文化就开始面临来自西方列强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挑战。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人在与世界文化的参照中把握了突破儒家文化的思想循环，重新认识自己的思想契机。这样，在中国近现代此起彼伏的政治、文化变革浪潮中突出了一个历史主题，就是改造国民的灵魂，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到20世纪，由数代作家尤其南方作家把这一文化主题演奏成了一曲新世纪的交响曲。

南北作家对外来挑战之反应是对比鲜明的。列数数百年来呼应时代潮流，要求变革的作家、思想家，我们可看到，南方作家同时也作为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中的知识界领袖人物，他们都试图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而改变中国的历史命运，而北方文人多半对改革持保守态度。虽然这些南方作家没有摆脱历史局限造成的某种思维框

架，在文化探索上没有最后实现自己的初衷，但这足以显示了南方人独特的、但也被南方作家自己遗忘了的文化心理素质。中原文化自北而南，从黄河流域向长江、珠江流域推进，以至于今日人们只把南方视为自然地理上的一个概念，而遗忘了文化意义上的南方的存在。其实，在人类童年期，中国便有过多元民族文化实体，南方有自身的自然景观与文化史迹，而正是这种背景造就了中国文化中独具一格的南方意识，提供了产生近现代历史变革新生力量的心理基础。

南方意识的遗忘是如下两方面发生的。首先是中国文化的内因。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语言行为区分为“语言”和“言语”。如果我们将这个思想应用到文化意义上，把作家看作一种文化系统的说话者，那么南方作家应该说是南方文化的发言人。可是，近现代南方作家是在士大夫正统教育下成长的，自小要饱读四书五经，熟习文言，对古人微言大义要有明白的了解。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只有服服贴贴接受士大夫阶层的言语习惯，才能与别人进行交际，因此他们要讲官话，因为那种语言符合身份。他们吃力地操一口蹩脚的北方官话，“北调”中又带一点“南腔”。这种教育提供了虚假的自我意识，久而久之，“言语中枢”衰退、病变，引起言语功能障碍，他们忘掉了怎样说南方的“方言”、“土话”，有点像孔乙己的模样，把手罩在碟子上对小孩说：“多乎哉？不多也。”我把这称之为文化上的失语症。其次是来自先进的西方文化冲击这个外因。西方文

化如此富有生命力，既唤起了南方作家变革的自觉，客观上又强化了他们的自我遗忘。

历史总是循环往复地提出同样的思想问题，使我们无法回避。当我们思考当今南方文坛的现状与未来走向时，我们发现，当代南方作家的命运和数百年、数千年以来的南方作家一样，其兴衰完全受制于历史所提供的文化背景，而非纯粹的艺术规律可以逆转。例如，像中国文学的近现代史几乎由南方作家一手编写，而近30年当代史则主要是北方作家唱独脚戏。这种作家地域分布的奇妙转折，只有相当固执的人才会断言其纯属偶然巧合。因此，本人着重从中国思想史角度来研究南方文学的前途，并试图打开传统文论的狭窄视野，对南方意识及文学艺术的发展作一次探究。

一

我们把南方意识看成是由于南方自然景观与漫长文化年代形成、积淀下来的南方文化感知世界所特有的思想方式，它体现为南方人共同文化基础的共同的心理素质，也体现在文学中的南方作风与南方气派。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在地理环境上是一片封闭的大陆，这使古代中国文化在长期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独立发展，对外部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加之最早开发的黄河流域特殊自然条件加速了定居农耕的历史过程，这片大陆在漫长的历史中终于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大一统的儒家文化圈。然而我们还要看看中国地

理的另一特性：地域辽阔，山脉纵横，平原、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南北跨度大，东西走向三级台阶，这把大陆分割成网络状，古时候交通往来十分艰难。这使中国历史起点呈现出多民族平衡发展又相互影响的状况，至今仍有50多个少数民族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数千年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上述地理环境的两重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南方自然景观(地貌、水文、气候)与中原地区大不一样，长江中下游与东南沿海地区，以海边和湖泊川泽为主要地貌特征，这里气候炎热、多雨，到处是绿水、青山、丛林、杂草、春花、秋实，大地一派生机。富饶的物产使人得到丰厚的生活报酬。春天永远是南方的特产。而黄河流域自然条件过于严峻，气候寒冷，景色单调，土地贫瘠，生活艰辛。自然界对人性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致使南北文化呈现差异，如土地贫瘠使人产生吃苦精神，生动活泼的自然界使人感到生活乐趣等等。对此，过去许多作家、思想家都有精辟解释，甚至两百多年前孟德斯鸠就在欧洲说过：“中国北方人比南方人勇敢。”在具体的对比分析之前，我不想妄言南北文化心理各有什么特色什么短长。我想最为基本的是人作为地球生物之一种，他与环境的关系也要服从生物规律制约。由于生存环境不同，生命会受到不同的自然选择压力，这对遗传差异的增加与行为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地球生命的形体大小、外貌特征、生活习惯都有千差万别，人类亦然。此外，长期生存于特定地域，利于积累生活经验。对于原始初民而言，其

生存的地理环境几乎就是他们的整个自然界，作为生活条件与观赏对象，影响着他们的居住、饮食、医药、服饰、交通、婚葬习俗等等。这种方式所形成的或许就是荣格心理学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或“原始意象”。它们是一些先天倾向，使一个人采取与自己祖先同样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人类种族史是在特定自然界中衍生的，甚至其天性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地理环境的烙印，构成其共同心理素质的先天基础。

中国神话是南北先民残存的童年记忆，对流传下来的神话进行比较研究就不难看出南北文化心理的差异。中原民族古代“重实际而黜玄想”，神话不发达，他们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日做梦。”（胡适语，转引自《茅盾评论文集》，下集244页）这段话对我们分析南北文化心理是颇有启发性的。北方民族较早进入农业社会，神话特征明显带农业文化的色彩，注重人事，有将人神化的倾向。许多北方神话充满悲剧性的压抑，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共工怒触不周山、刑天舞干戚、大禹治水、愚公移山，这些对失败英雄百折不回的意志的歌颂，也是我们民族历史灾难深重的反映。南方神话则显示南方先民重自然轻人伦的文化心理，现流传的南方各族神话几乎都有喜怒无常的雷公，代表天界伟力，呼风唤雨。一般地说，神话故事中关于世界起源和人类诞生的主题

是人类童年期正常的心理反映。可是，北方神话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而中国的神话系统中有关开天辟地和人诞生的主题，是南方人提出和解答的。开天辟地的盘古原系一只狗，是苗蛮先民的图腾，女娲则炼五色石补天，抟土作人。这些神话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伦关系，表现了南方先民对自然界怀有崇敬心理，对人自身的自豪感以及开天辟地的开创精神。这种可贵的精神素质在中国文化后来发展中逐步萎缩消失。北方神话严肃、理性，有单调的伦理寓意而想象力贫乏；南方神话则欢愉、感性，具有极高的想象力，带原始野蛮成份和神秘主义空幻的色彩。神话是先民幻觉中的真实存在，因此神话艺术风格的差异隐示了文化心理的不同。可以看出，重自然还是重人伦，才是南北神话和文化心理最根本的分界。

西周诸侯分封，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下来。周末群雄并起，非华夏族的诸侯攻击西周，而秦统一又使多民族归于大一统。春秋战国造成长期的政治多元局势，不同地区存在巨大的商品交流，与之相应的是文化上具不同地域背景的诸子百家，十分热闹，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大繁荣。当时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交汇、冲突、影响，正是这种文化繁荣内在的基本原因。由于一统天下的周礼处于崩溃状态，新思想新文化挣脱了传统礼法的层层束缚席卷社会。孔子建立儒家学说努力复礼，但并不主宰当时潮流。其时，楚国在南方兴起，在春秋时先后吞并四十五国，疆土最大，十分好战。楚专力攻

伐华夏族诸侯，五年不出兵，算是莫大耻辱，死后不得见祖先。楚人文化上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征伐受指谪，楚君就说：“我蛮夷也！”以示不认同中原文化规范。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楚文化充分吸收了南方民族和华夏族的文化营养，又保持自己的独特魅力，以其灿烂成就给中国文化注入了一种新鲜、活泼、思想深刻南方精神。由老子创始，庄子、杨朱师承的道家学说是诸子百家中代表南方意识的杰出创造。老子的哲学智慧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他关心万物运行，思考宇宙本体的问题，“道”是“万物之宗”，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与支配世界的法则。他观察了自然界万物的变化情状，有与无、阴与阳、存与亡、福与祸、成与败、古与今相互间的因果关系，关于这些重要矛盾法则的思索表达了深刻又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庄子是杰出的散文作家，他的寓言达到高妙的艺术境界。他用相对主义表达了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绝对怀疑，他对个人自由的思索，揭示了许多深刻的人生体验。道家最早看出儒家仁义道德的实行并非带来真正的仁义，相反产生了种种虚伪、欺诈、掠夺，因之对政治人伦采取了轻蔑的批判态度。老子主张绝仁弃义，庄子著书抨击儒墨各家，杨朱反对墨子的兼爱和儒家的伦理思想，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把道家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地步。如老子不愧是中国思想史第一个理论哲学家一样，屈原是中国文学第一个文人作家。他的气魄宏伟，文辞雄浑、奇特而又清丽。他的楚辞明显有别于北方诗

经》那种严谨风格，离奇怪诞，富于想象，“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所表达的是南方文化的自我意识与情感。当时华夏族掌文化的人叫史，苗蛮族掌文化的人叫巫，史巫之间一直存在对立斗争。孔子主张对神鬼敬而远之，而楚国则盛行巫风。神鬼被楚人认为可敬可爱，祭祀神鬼必用巫歌，《九歌》就是巫师祭神用的歌曲。《国殇》这样赞美为国捐躯的将士：“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招魂》呼唤那些远去四方的魂归来：“魂兮归来！自故居些。”巫文化给屈原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楚辞充分运用神话材料，驰骋其丰富想象，宇宙万物被看作有生命的存在，使他的诗篇展现了极广阔的世界。屈原宇宙意识的深远和对个人情感的自由抒发，在中国文学史中罕见其匹。他博学多识，勤于思考，对世界充满好奇心而对传统观念则持一种怀疑态度，这些思想特点与道家思想很有相通之处。可是楚文化处于较发达的中原文明政治、文化的强大压力之下，南方作家也就觉察了南方没有什么历史前途，因此才出现了后来南方文化畸变发展的先兆。道家虽然重视人支配宇宙的能动性，但在人世变迁面前却无能为力，只好主张对利害得失、是非荣辱采取听其自然的消极态度。老子向往小国寡民，庄子歌颂无君的理想，流露出他们厌恶西周旧制度，又不满新兴地主阶级一统专制的绝望心理。屈原与道家很不相同之处是他积极入世，一生试图拯救南方政治文化被灭亡的命运，这全属徒劳。他的忧患意识和愚忠观念，像老庄与世无争的处世哲学

一样，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楚文化的灿烂光华与其说是富于朝气的磅礴日出，不如说是日落之际的回光返照。

南方文化没有得到成熟发展的起码条件，在历史——文化断层之处留下大量碎片与畸变幻象。一种富于智慧的、积极的文化精神能使人类开天辟地创造历史，然而优秀的文化精神有别于贱生贱长的文化，它又是十分脆弱的，其对历史的能动性又以历史条件的良好准备为前提。在中国历史中，苗蛮与华夏的战争，屡战屡败——这不过是人类历史无数部族战争最乏味的一二幕，甚至引起不起稚童的好奇心，可是它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选择。试想，若是胜利一方是南蛮，可以推想中国历史会面目全非。南蛮不具备取胜的政治经济力量，虽“好斗”，但精神素质的强悍不及北方民族。秦之后大一统基础十分稳定，项羽一度依靠南方势力复辟；魏晋之时，蜀、吴还再度昙花一现，然而，只是给后人留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和一部三国故事罢了。

古代南北战争基本上是北胜南败，这或许算一条历史经验吧。中国大地诸多民族，华夏民族是唯一承前启后发展的古民族。秦完成统一大业，而孔子则为未来两千年大一统封建帝国准备了意识形态。他早意识到天降大任于自己，他编诗经，修春秋，从诸子百家中清理出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教训。儒家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起支配地位的是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及血缘情感，

特权主义、家长统治、祖先至上、愚忠观念、平均主义和群体至上。从孔子开始就有顽固的复古倾向，华夏族一直是炎黄帝的嫡系子孙，血统纯正，那古风礼仪，被孔子崇拜得不得了。殊不知那不过是从氏族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陋习，偏要自以为最高级文明；华夏之外，非蛮即夷，连西方列强也被视为“蛮夷”。其实儒家文化最无可救药之处是伦理本位的思维模式。因为伦理本位的思想系统不需要接受来自经验知识的挑战而修改，并且纠缠于人伦亦不需要吸取其他文化的丰富的思想营养。因此，儒家文化限制了新思想萌芽，窒息了创新精神。这种在贫瘠、单调、寒冷、干燥、缺乏阳光的北方土壤上生长的文化植物十分坚韧、顽强、贱生贱长，只求生存不求发展。儒家学说统治中国文化两千多年不靠什么优良品质，不过是由于低级文化植物的根性，使其在寒冷的封建长夜中铺天盖地地生长，席卷了同化了一切，成为影响国内外的“儒家文化圈”。与此相反，楚文化之后，南方文化不复具有完整独立的发展形态，只是在一统儒家文化圈中畸形地发展了自身，成为儒家文化的补充。一种情况是“儒道互补”，富于智慧的道家思想为失意者提供了消极避世的精神归宿。另一种是“刚柔相济”，与北方诗文阳刚之气对应，南方诗篇做尽了女儿媚态，细腻、轻俏、温柔缠绵，一种畸形走样的南国的浪漫情调，但不过是北方壮士的风流小酌。中国人古有“阴阳互补”、“刚柔相济”的辩证思维，正是这种辩证，儒家实践理性的阳刚正气永远处于核心地位，其

他不利思想通通畸变后作陪衬，这也是一幕妙不可言的“三突出”吧。

虽然两千年来南方人已逐步被“教化”，但只要南方地域存在，地域文化就不会消失，南方人的文化本色也不会消失。按现代人类学家的看法，尽管一个部族可以有自己百分之九十的行为和邻居各族共同，但总有一点根本不同。这一点也许很少，但它对这个部族本身的独特发展方向有重要作用，使这一种族成为这一族而不是其他族。正如科学有“规范”，文化存在也有其相对稳定的模式结构，这就是文化的“基因库”。它世代承传，借此适应世界以及相互沟通。当更先进的文明入侵时，现有文化基因往往不是简单地被消灭，而是被压抑而转入意识深层中继续积淀。随着北方文化南下，南方文化的完整形态解体了，儒家思想在南方得到理智的承认，而南方原有的文化意识则被压抑于潜意识层次。儒家文化垄断整个中国文化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而南北文化的地区差异是一直存在的。魏晋南北朝时，政治经济上的分裂使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暂时打破，南北两地的文化差别一度扩大，形成迥然不同的文化风格。北方门阀士族为保持其封建宗法特权，尊奉儒家传统；南方人则尚清淡，擅明理，好老庄。明中叶开始，在工商发达的南方沿海地区，终于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加之西方文化的初步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由保守逐渐走向革新，新思想迅速萌发，出现了代表市民阶层的以反理学为标帜的人文主义作家，如李贽、袁宏道、汤显祖、金圣